

蒼南文史資料

第十輯

——蒼南知名人士傳略之一——

CANG NAN WEN SHI ZILIAOCA

蒼南知名人士傳略

CANG NAN ZHI MING REN SHI CHU

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
浙江省蒼南縣委員會
文史資料委員會編

蒼南文史資料

——蒼南知名人士傳略之一

政協蒼南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
一九九五年三月

前 言

苍南人杰地灵,自古至今人才辈出,已故前辈如创办我国第一份数学报的黄庆澄,教育家刘绍宽,数学家姜立夫、李锐夫,生药学家叶三多,木刻家林夫等,均在已出版的《苍南文史资料》中作过介绍。这辑“苍南知名人士传略”是介绍当代国内在一些领域里有所建树的苍南籍知名人士。

我们出版这本小册子,旨在为存史,也为激励苍南百万人民,特别是年青的一代,在苍南的两个文明建设中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这辑文史资料是苍南知名人士传略的第一辑,我们将相继出版第二辑、第三辑……很希望苍南各界人士以及知情者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和线索,以便本会文史委研究、征集、编纂。

政协苍南县委员会主席

邓 伦 修

1995年3月10日

目 录

苏渊雷自传 苏渊雷(1)

吴襄教授传略 冯镇沅(20)

徐规自传 徐 规(30)

张禹自传 张 禹(43)

许威汉传略 许威汉 陈五云(58)

我的小传 谢 云(70)

华纫秋自传 华纫秋(88)

半生小记 黄传会(96)



苏渊雷自传

一九〇八年十月二十三日，(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九月廿九日)我出生于宋代爱国诗人霁山和近代启蒙思想家宋平子的故乡——浙江省平阳县一个名叫玉龙口的村庄。始名中常，字仲翔。一九三三年出狱后，易名渊雷。别署钵翁，又号**逝园**。曾用过逝波、易筑、苏翻、苏子等笔名。

玉龙口风景秀丽，河流交叉，我的祖辈在那里过着半耕半读的小康生活。祖父宗轼，是县学生员。外祖父徐笛秋，和祖父同年进学，是我启蒙人。父亲寿芝，兄弟六人，他当大。母亲徐氏，年二十

来归先君。五年后，先君见背。孤儿寡妇，时见欺凌，在我幼小的心灵上，投下了阴影。在《玄黄集叙》中，我曾有过形象化的描述：

“余生四岁而孤，兄弟二人惟孀母是依。灯影机声下每睹慈容哀戚，辄悲不自胜。伤感之质，盖植根于此。母故不知书，然少慧，聆塾中人诵诗，即琅琅上口。一夕，风雨甚，拂晓窗外鸟声啾啾，母吟唐人‘春眠不觉晓’绝句，伯兄暨余随声唱和，殊以为乐。

家有小园，先曾祖父梧生公手植杨柳数株，皆成围。夏日，绿阴如幄，余尝游憩其下。高柳鸣蝉，声声摇曳，斜阳一抹，脉脉微波，乃感大自然之同情为无限也。”

儿时，每见地主闯入佃户家催租逼债，翻箱倒笼，或仗势欺人，总不胜愤懑，对被侮辱和被损害者每寄同情；推而至于闻书掉泪，替古人担忧而不能自己。这些不仅逐渐形成了我日后愤世疾俗和悯物煦悲的性格，而且也是我所以投身救亡运动和倾向民主革命的契机。

一 赴学求友

我五岁发蒙，就学于私塾。后随侍外祖父数年，受其古典诗歌方面的熏陶。十二岁以第一名成绩，毕业于金乡高等小学。十三岁入南雁荡会文书院，从张汉杰师进修古典文学，始读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，唐宋八大家文及古近体诗，并其他韵语。

一九二二年秋，考入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（旧制本科在温州）。获交蔡雄等学友，共同研讨新旧文学。蔡雄字思牟，为学朴实，喜探名理。尝与我论诗，谓谢跳“朔风吹飞雨，萧条江上来”二句，壮则壮矣，终不若陶公“微雨从东来，好风与之俱”之为一片神行，不费气力。他为文渊茂遒劲，上师魏晋。尝谓西汉古朴，难得其神；齐梁绮靡，不足取法；惟魏晋间文，情词并茂，斯为上乘。谈言微中，亦

艺苑之珠林也。

五四运动后，新文艺兴起。蔡雄与我酷好之。结合同学朱维之、金贯真（烈士）等，先后组织“宏文社”、“血波社”，因文会友，以抒情怀。不二年，整理国故之说方盛，蔡雄与我自觉学植肤浅，守此非安心立命之道，转而钻研故籍，藉证新知。于是读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文选》、周秦诸子，于义理深微处，往往摭拾众说，参以己见，思成一家言。我俩所作诗文合刻为《中谷集》，张宗祥（冷僧）为题“兰言”二字。我造《唯美论》，泛论文艺。蔡雄有《人道篇》，洋洋数千言，眷怀家国，笔下伤心。

一九二四年冬，奉直战罢，孙中山北上，倡开国民会议，我俩开始关注国事，投身社会运动。一九二五年“五卅”惨案，全国大震，革命风潮激荡，~~翼翼~~跨入新时代。此时稍稍明了国势国情，社会主义思潮渐入脑际。孙中山逝世，全国征求新党员时，我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，并担任温州学生联合会主席，从事温州各界救国会工作。得读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共产主义ABC》、《新社会观》等秘籍，爱不释手。乃随举其义，以与现实相印证；并在校刊发表了《十月革命之歌》长诗。始读《楚辞》，作《骚怨》四首，（诗集编年始此）。其间，我俩每借故外出，从事宣传演讲，校内外以“狂生”目之。

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，北平执政府前惨杀学生案起，耗至，我方据案，笔为之辍。与蔡雄奔走呼号，益无暇日。四月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夏间，衔学生联合会命，自温赴粤，代表浙江省出席全国第八届学代会。临行，蔡雄握手告别：“别矣珍重！行见子之归，示我以新曙光也！”会成，参加张太雷主持的党团活动；访黄花冈，谒七十二烈士墓。归，作《粤游新记》，盛扬彼中新政。是年秋，转为中共党员，参加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活动。入冬，军阀孙传芳所属闽军窜温，人心惶惶。学校提前放假，蔡雄与我独留，思有所展布。合编《一年来温州学生运动的回顾与展望》小册子。

我在学校就读时，即已嗜读《庄子》、《楚辞》、《史·汉》、《文选》、《世说新语》、《维摩诘经》等，养成了广泛阅读文史的兴趣。毕

业时，毅然立下研索文史哲学的志愿，告别了学生时代，迈向新的征途。

二 七年炼狱

一九二七年春，国民革命北伐军底定东南，百政待新。我等益自奋勉，举凡教育民运诸端，无不躬与其役。自恃年盛，不惮艰苦，且以不合污自持。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发生，不好形势急转直下。四月十五日清晨，永嘉县党部突被包围。驻温省防军翁某声称：奉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密令，将我和戴树棠、陈仲雷三人逮捕入狱。

蔡雄独留温，力谋营救，濒危者再。五月三日，我等三人由温州起解，循海路经宁波转押杭州陆军监狱。蔡雄来信，给我以力量。他引黄仲则诗：“马因识路真疲路，蝉到吞声尚有声”二句，要我细思之！狱中坚持斗争。我们绝食，传递书信，创办秘密刊物，彼此鼓舞斗志。又上书蔡元培，为全国被捕青年请命。后经所谓“特种刑事法庭”审讯，我被判刑十九年。狱中尝集黄仲则诗寄怀蔡雄，有云：“可奈离心争一寸，山阳空听笛声愁。天涯几辈同漂泊。岂有生才似此休”！那知我们抵抗没几天，蔡雄即以惨死闻。山阳听笛，竟成诗讫，年仅二十。

蔡雄参加革命后，于学益进。遇有宣传文字，率由我俩交互口授笔赴而成。稿定，亦不知何者出蔡口，何者属余手，斯亦一时乐事，曾几何时，都成伤心史料矣。蔡雄是我生平第一知己。他的壮烈牺牲，使我的心灵深受打击。狱中写下一首《伤感之秋》，以“逝波”笔名，密寄上海《幻洲》半月刊（潘汉年主编）发表。诗云：

从冰天雪地的北国，涌出了
一轮红日，它放射出万丈光芒，

把占据着大地的黑暗一齐驱散，
胜利之神将给它历史上无比荣光！

从荒寒寥阔的北冰洋，流出了
一道红艳的血波，它翻腾滚伏，
流过东海，把深蓝的海水染个通红。
哦，那不是红色的水呵，那是自由的血轮！

啊，古城里酣梦的人们被血波推醒了，
朦胧的睡眠被红光射透了！
起来呵，我们要逐争自由的波浪，
起来呵，我们要迎接千载一时的晨光！

我们要创造新生的太阳，因为它是光，
我们要酝酿甜美的琼浆，因为它是爱，
我们要消灭刑法，因为它是人类的耻辱，
我们要推倒特座，因为它是罪恶的屏障！

为了这，我们跑上革命的战场，
为了这，我们投入沈霾的地狱。
争自由的朋友们，不要怨艾，不要惆怅，
要不断地奋争啊，不断地努力！

我抹去了泪痕，为继承战士与诗人——蔡雄和无数先烈未完成的使命，开始了狱中半争生活。与同囚战友们以昂扬的斗志，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。《通俗资本论》、《经济学大纲》、《帝国主义论》等，就是这时研读的。自修英语，阅读《罪与罚》、《屠场》、《马丁·伊登》等多种原本小说和《物种原始》、《比较宪法》、《欧洲政府》、《社会学导论》、《狄慈根哲学论集》及其它，如《世界革命史》、《世界

史纲》、《古代社会》等著作；并涉猎佛典、《圣经》、《易藏丛书》、手点《相台本五经古注》及《章氏丛书》。初步运用历史辩证观点，讲通老庄、黑格尔和达尔文等学说，写成了第一部学术专著《易学会通》五万余言。（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）

一九三三年六月，刑期执行逾三分之一时，由旅杭温州同乡会长、水利专家林同庄先生，设法保我出狱。我漫步杭州城站公园，伸臂呼吸自由空气，百般追忆，千般思索，辛酸苦辣，一起涌上心头！

三 抗战前后

出狱后，与党组织失去联系。受聘为上海世界书局编辑。在沪不久，与先后出狱的同志陆续会齐，参加党的外围工作，如薛暮桥、骆耕漠等主持的《中国农村》刊物和《中国经济情报社》的某些活动。一九三四年秋，我又与钱俊瑞、徐雪寒等发起创办“新知书店”。继赴南京，同千家驹、孙晓村、赖亚力等一起，参加救国会、求知合作社（社长谢无量）和新兴社会科学座谈会等活动。这期间通读了《王船山遗书》、《元曲选》、《东坡全集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云笈七籤》，遍阅历代笔记小说；先后发表了《文化综合论》、《宇宙疑谜发展史》、《孔学三种》等论著；并分纂《辞林》及李石岑和张栗原主编的《哲学词典》中有关古典哲学部分的条目。

抗战前夕，写了《论哲学之战斗性与实践性》一文，批判当时流行的几种错误理论（如胡适所谓的“五鬼闹中华”）。指出：哲学是一种观念形态，是人类最高级精神活动之产物。它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，似乎疏远一点，但在人心的最深处。却支配并指导着我们全部的生活。哲学，正因为它是人类思想的火花，又是生活斗争的精神武器，所以是战斗性的；同时，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革而发展，所以又是实践的。从发生上说，它是客观事物一般规律在人类头脑里的反映，是物质运动之内在复杂形态，是“所作”。从作用上说，它

是变革世界的能力，是廓清摧朽的使者，是“能作”。这反作用与能动性二点，正是辩证论者自别于机械论者之处。在历史上，常是哲学思想的批评，先于社会现实的变革，但本质上，是社会的客观因素决定了它。哲学家只不过导夫先路，作知更之鸟。黑格尔所谓“枭鸟入夜始飞翔”，哲学家当社会没落而出现，正是绝好的譬喻。我们的哲学，对于现实的看法是本质的，关联的；对于现实的处理方法是辩证的、能动的；因而是唯物的而不是观念的。这在当时富有现实意义。

南京撤退前夕，在危城中接编沈钧儒为社长的《抗敌周报》，直至最后一期。抗战期间，辗转武汉、衡阳、重庆等地，从事抗战后勤工作。武汉撤退前夕，说服军医署长胡兰生（时担任其机要秘书），拨出大批医疗器材、药物交由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运往延安，成立后方陆军医院。旋出重庆“中央政治学校”，与贺麟、冯友兰等一起分授哲学课，同时兼国立体专、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国文讲席。一九四三年秋，辞去政校课务，本顾亭休“学者必先治生”之旨，在重庆北碚文化区创办“钵水斋”书肆（后移重庆上清寺），以文会友，结纳中外名流。尝从流寓蜀中耆宿马浮、章行严、柳翼谋、沈尹默、张闳声、谢无量诸老游，论道谈艺，为学日进。刊行《钵水斋丛书》数种，内有《天人四论》、《名理新论》、《民族文化论纲》等，出版了《宋平子（衡）评传》、《玄奘新传》等书。旧政协开会期间，曾暂兼《中国时报》主笔，为撰《发刊词》定调，写了《论简政》、《为参政会诸公进一解》等文，致为当局者所忌，不久即辞去。抗战胜利后返沪，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秘书兼第一处长。淮海战役期间，在会上力排众议，反对派送医护大队分赴蒋军前线参加内战。旋就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教授兼总务长之职。自印《钵水文约》、《学思文粹》、兼为《新民报》写专栏文字《苏子语业》。

解放战争节节胜利。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晨五时，彻夜的炮声消歇了。晓色迷蒙中，我打开窗子向街头一望，一阵奋激的喜悦之情，掠过了廿年静滞的心头。解放了。想起二十多年前身亲

北伐战役时,那种如火如荼的热情,和今日的凭栏身手一对照,不禁 悽然泪下。当即口占一绝:

二十年前雀跃情, 一般辛苦望云旌。
祇今寂寂楼头坐, 输与戎衣结队行。

又赋《杨柳枝》三首:

廿年心事柳萧萧, 长忆门前旧板桥。
一自美人和泪别, 愁风愁雨到今朝。

劫换华年两鬓萧, 几回攀恨赤栏桥。
春江碧涨秋江白, 一样魂消奈此朝。

不须闻笛怨飘萧, 取次春风指灞桥。
百尺柔条千尺水, 未曾断送是明朝。

四 祖国之恋

面对着新中国的诞生,“一片江山突兀来”,直是欣喜若狂。回想起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,我国为拒签和约与收回青岛问题,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潮,全国罢课,抵制日货。那时我才十二岁,便自觉响应,积极参加爱国运动。多少年来,从关心世局,到投身革命,坚持为党做外围工作,无不流露出一一个“知识分子移行”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和平的满腔热忱。我深深感到,只有对祖国有深切的了解,才会有助于自己的祖国。

解放后,我首任上海市军管会高等教育处兼文管会秘书,负责筹备工作。在沪江大学第二院及华东区各训练班讲授《社会发展

史》。继调充华东财委会计划部专员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；兼民盟上海市委宣传委员会副主任。这时期，发表论文多篇。其中《对于清理祖国文献的初步意见》一文，提出了（一）普及与提高相结合；（二）形式与内容相结合；（三）批判与综合相结合；（四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四项原由。自印《旧著存髓》、《和平鼓吹》两本小册子；为温州革命文献展览会写过《追忆大革命时代活跃于浙东南的几位坚贞奋斗的烈士》小册子，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印行《白居易传论》、《李杜诗选》、《元白诗选》。主编《国民经济实用词典》。

一九五七年五月，针对高校中存在的问题，在《文汇报》和《解放日报》上，几乎同时发表两篇文章，提出“专家教育与通才教育”、“关心时事与自觉学习”、“教学大纲与课堂争鸣”、“团结老辈与培养新生，”以及知识分子如何进行自觉改造、如何正确贯彻“双百”方针等问题，不料于58年反右“补课”时，被错划为“右派”，调到哈尔滨师范学院。出关初过都门有诗书感：

国门初入泪初零， 翘首高天皎日星。
陡觉违时伤老大， 谁能负气忍伶俜？
故人好在音先断， 旧眷轻抛梦久醒。
明发榆关更北上， 风光应不异南垌！

抵哈市之翌日，即去松花江畔晚眺：

松江落日晚霞明， 浴物澄心彻底清。
入画长桥天共远， 迷花翠屿浪初平。
浮云上下古今意， 流水东西南北情。
著我劳生何处是， 笑看辽鹤一身轻。

这时，一种“吾生已惯波三折，放眼乾坤日月长”的勇气，促使我发愤忘忧，将酝酿多年的写作计划付诸实行。逾四年（一九六二年），

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得以“摘帽”。旋在黑龙江史学会主持“读史讲座”。十年内乱，复遭冤屈，插队落户，所更非一，终于被勒令“退休”，遣送回籍。但学术研究，始终不辍。除《读史举要》成书外，又陆续发表了《论龚自珍》、《风雅新论》，兼及诸子、佛学研究，写成《孔学四论》、《佛学通讲》各数万言。改写《玄奘新传》，编集历年所作诗词为《钵水斋集》（自一九二五年迄今近二千首）。一九七六年十月，写成《论诗绝句》七十余首（八三年由中州书画社出版）。

三中全会以后，于一九七九年初，自退休原籍平阳返沪复职，仍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，讲授中国古代史学史。兼任全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、中国韵文学会顾问、全国佛协常务理事、上海佛协副会长、宗教学会理事等职。从事禅宗语录《五灯会元》的校点和王渔洋选集的选注工作。计自五八年秋离沪赴哈，迄兹重剪淞波，忽忽又二十三年。借用刘禹锡成句，题诗一首。

萍浮南北无根蒂，“二十三年弃置身”。
连塞秋笳流远梦，连江寒雨滞留人。
卓锥每发香严叹，把盏仍赊歇浦春。
独憾东坡语孟浪，那能拈笔已如神。

（东坡出狱赋诗，有“试拈诗笔已如神”句，致为朱熹所讥。其然，岂其然？）

五 学无常师

东方自赞，文史足用；孝标自叙，坎坷一生。比迹前修，亦有可言。

自惟起自孤露，既乏家学渊源，亦鲜师门传授。王献之世有未知，张茂先我所不解。几十年来，暗中摸索。无非想学那流萤向暗

中发光，学那蜜蜂为了酿蜜而采集百花。记得五十多年前，狱中初读骆宾王《萤火赋》，瞥见流萤在窗外闪闪发光，不禁吟出了：“相逢莫漫问前路，好向人间暗处明，吟到灵台明灭处，几疑身亦是流萤”。为了抒发一往的深情，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，我曾坚定不移地向曲折的人生道路挺进。生活的磨难成全了我，使我在忧患中获得新生，养成了不忧、不惑、不惧的性格。不管生活的舒惨或处境的顺逆如何，我对革命事业的胜利，始终没有丧失过信心。而大同社会的战取，生民苦乐的关怀，更是我一生思想、生活、文字的基调。

回忆在学术思想的倾向方面，晚清启蒙思想家中，若康长素、谭复生、梁任公、严几道、章太炎，以及吾乡孙仲容、宋平子诸氏，尤所私淑。这几位在当时都是风云人物，虽论治有缓急之分，论学有今古之异，但他们欲以礼运大同、周官墨子的学说，与当时所谓民权、自由、宪政、均富诸“新学”相印证，而为古老的农业国，找一新生的出路，则初无二致。益以他们学行足以相副，声气足以感召，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前，数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解放的基础，都是他们一推一挽共同奠定起来的。我得于忧患中恣读其遗书，感悟尤多。

并世如陈仲甫、鲁迅、郭沫若诸氏，于反抗既成权威，与更新社会认识上，曾给我不少影响。另一方面，我又受点龚定庵“怨去吹箫、狂来说剑”那种名士风流的熏染，因而忧郁、飞扬、愤激的气氛，笼罩着我一身。

世界无尽，人生有群。一己的苦乐，一时的得失，持与大众的艰虞、世局的盈虚相较，则一切诗情梦想，罗曼谛克，在此无情的现实之前，无不粉身碎骨，烟消云散了。

“大雄无畏见精神，一片慈悲现此身；我为众生入地狱，不辞苦厄敢生嗔”。七年炼狱，使我更懂得人生的价值。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。古今中外一切学问的总归趋，无非是帮助我们对于世界获得更彻底的认识，对于思维获得更严密的训练，对于人生获得更合理的态度。因而，利用厚生，戡天弘道，一方创造人类的历史，同时改变

世界的现状。使虱于天地的微躯，得鸟瞰八方之乐，而兴俯仰无穷之志，打叠起人生向上的勇气，鼓荡着灵魂的远征。这就树立起我对总体智慧和人生理想的观点。试图演绎古今圣哲的绪论，融会文史科学的精华，用轻快的笔调，发深湛的情理，触及宇宙与人生的全貌，而出以缩压或袖珍的方式。会心不远，别调独弹。前后所撰《易学会通》、《宇宙疑谜发展史》、《天人四论》、《名理新论》等，无非想实现这一理想。一九三四年造《文化综合论》时，便提出这理论纲要。认为：没有批判的综合，是机会主义的“综合”；没有综合的批判，是无政府主义的“批判”。综合的先行程序是批判。现在的综合已不是架空的概念之连络，而是依存于经济基础之真实的适应。历史的传统与社会的业力象阿尔卑斯山一样，压在我们的头顶：我们不能抛却历史所提供的材料，而凭空建筑自己合意的天堂。不错，人类创造历史，但不是恰如其所欲；只能在历史现实的条件下，展开自由创造的工作。所以人类文化遗产的继承，是生物学上自然遗传的意义，不是社会学上法定继承的意义。我们即使口头上声明：愿意放弃这份文化遗产，但实际上，过去文化的势力，总以种种姿态在社会心的最深处潜藏者，到处左右我们的行动。依照思想之辨证的法则，文化之史的发展规律，也断不容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弃之如敝屣；更何况它还是开放新文化灿烂之花的沃土呢！所以，文化综合运动，不仅为中国现代所需要，亦为世界各国所需要，因而含有世界的意义。要在吾人善于把握客观的发展性，充实主观的能动性，而引起有意识有目的的伟大运动。文化综合运动的精神尽于“批判”、“综合”四字。所以在综合之先，应尽量对于“西学”（资产阶级上升期理论）或“国故”（包括诸子学、史学、文学等）作出合理的批判，然后才能建设祖国谨严的灿烂的新文化体系。

六 自我批判

四十多年前，友人徐雪寒同志曾对我说：“我总想，你在文化上应该有大贡献的；但似乎又有限止你完成它的情形。主要的原因，你接受旧风格和生活调子太多，新的东西被你固有东西所融化了，改变了”又说：“弟尝自思，我兄出处，总与弟等不必同。当凌空凤翥，鸣震九天。然则以文字杂感，恐难终老，出入古今，恐肆于放逸。兄文奇美，弟所心折。但于今日问题之讨论，则颇为有害，盖时人将忽略其质也。设去之乎者也引经据典之形式，以雄辩并说明态度出之，或更有助于大众之了解”。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，但我结习未除，忍俊不禁。有时壮怀激烈，有时悲心忽起。记得抗战前夕，华北吃紧，我曾发表长诗《万里长城的控诉》，唤起同仇敌忾的人心。抗战初过武汉，独上黄鹤楼，大呼“西边余故垒，北顾失幽州，百尺危楼在，谁歌万古愁”；将撤退武汉时，夜上蛇山留别，又发出“千家梦好万灯青，一派微茫接远汀，如此江山如此夜，可应悽坐泣新亭”的感慨。

一九四〇年五月，重庆遭日机摧毁，日击心伤。因本小雅诗人之旨，一夕写成《陪都赋》。自叙有云：“仆生逢多难，才谢前良，幸栖止之有托，谅中兴之在望。爰摭一得之忱，用敷新都之美。山川人物，既磊落而英多；土风岁时，岂易地以增感。言婉而约，可诵可歌。庶闻者益坚必胜之心，而凛‘其亡’之痛云尔”。二次世界大战，牵动人类全部历史，波澜壮阔，动魄惊心。先后写成七律三十二首，自为笺证，陈仲陶氏题词所谓：“苏子天人学，文采古墨博，瀛谈寓悲悯，余事诗史尊”，殆实录也。

抗战胜利，栖迟海上，迎接全国解放。作为“知识分子移行者”的我，总想在民族的形式上，打下时代的烙印。上海解放初，首先响应大公报《我爱中国》的征文，忝列第一，约略传出我那时喜悦的心情。